

Week Topic : The Rationales for the U.S. and Japan

Presenter : Yang-Ho, Chang 張洋赫

ID : M006070015

Date: 2013/4/16

The Rationales for the U.S. and Japan

Summary

本文以日本學者 (Tomohito Shinoda) 和美國學者 (Michael Mastanduno) 的觀點，提出盟友之間實力的對比與利益交換之過程，尤以歷史的演進分別闡述兩變量如何影響美日同盟關係的相互制約機制及亞太安全區域內的國際互動。本文多次在內文中探討到現實主義之同盟理論 (Alliance Theory) 的概念，描述兩國家透過締結同盟關係強化本身安全時，會面臨兩種類型的困境，分別為「拋棄 (Abandonment)」與「牽連 (Abandonment)」。前者係為承諾過於薄弱，擔心國家在面臨威脅時，遭到同盟國之背棄或同盟國解除關係退回中立者之地位。而後者，即為過度承諾，擔心會涉及同盟國不必要之戰爭。本文利用諸多個案釋例討論美日同盟關係互動之賽局，雖然簡化聯盟管理之複雜性，但藉由此觀念傳達聯盟管理並非機械的線性思維，而是各種因素相互制約的動態系統。在比較分析的層面上，日本學者透過日本與美國的雙邊關係為出發點，探討冷戰期間傳統的同盟成本與利益，之後再由冷戰過後的新同盟成本與利益、日本民主黨上台後的外交手腕，說明美日同盟關係本質上的改變。美國學者試圖提出一個涵蓋更多社會事實的同盟管理觀點，先以亞太地區正進行權力重組的方向思考東亞區域主導地位的平衡，其中包括中國崛起、北韓的核武問題和東南亞的恐怖主義等。其次，美國學者詳述日本係為美國的重要經貿夥伴，並應以政治經濟的避險方式將中國整合至世界經濟體系當中；最後再以日本政黨的輪替以及民意的背書肯定美日同盟關係的持續性。

日本自民黨自 1955 年組黨以來，即矢志要修改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所制定之日本憲法。不過，受限於當時日本國內無法形成共識，

和吉田茂內閣所標榜的「先以經濟復甦為首，後再談軍備」之路線，亦即所謂的「吉田主義」，修憲主張派之聲隨即沉寂下去，戰後體制下之產物專職防守之防衛原則即誕生，並主導戰後日本防衛政策迄今。在時間的推演之下，「吉田主義」所構建的戰後體制以及專職防守之防衛原則，即是為阻礙日本與其他一般正常國家一樣地行使自衛權，以及讓自衛隊參與國際貢獻之障礙，而成為被改革的對象。

80 年代左右，日本已經發展成為繼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加上美國雷根政府於執政期間所採取的擴大軍備圍堵蘇聯之戰略，於 1982 年至 1987 年間，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其路線倡行國家正常化之論述，企圖扭轉「吉田主義」之路線。在首相任內，中曾根康弘為宣揚日本之國際互動觀感，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對開發中國家展開積極援助外交，並且為了強化與美國之軍事合作，屢屢提高日本防衛預算之上限。因為中曾根康弘認為，吉田路線大大扭取了日本國民精神，罔顧人民觀感，將防衛事務完全交由第三者，並只顧本國和平之下的和平主義者。職是之故，中曾根康弘認為，現行憲法前言所闡述的立憲精神，是將日本的國防安全託付在週邊國家之善意，而不是透過自身努力來維護，這種主張已經不符合國際社會之現實狀況，有必要予以修改。同時，為了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周邊國家宣示日本之自衛決心，規定日本不保有包括自衛戰力在內之軍事力量，以及不承認包括防衛戰爭在內的交戰權之憲法第九條第二項，也應該加以修改。此外，中曾根康弘還主張，集體自衛權是為彌補個別自衛權之不足而設，兩者是一體兩面，為維護本國安全而行駛集體自衛權，乃理所當然。

自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正進行權力重組，而且「上升的中國、衰退的日本」為目前貼切的寫照。在政治與國際層面上，美日同盟的未來以及美中關係的走向，是觀察台灣安全、中國之崛起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根本利益，最不容乎視的兩個座標。就前者而言，眾所皆知，一九六〇年所修正的「美日安保條約」，因其爭議性的「遠東條款」，一九七二年中、日進行建交談判之際，曾引起北京方面的強烈質疑，自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前蘇聯的威脅暫時消失，轉型中的美、日安保體制，愈加明顯是以中國大陸為防範的對象，例如在一九九七年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所謂的「周邊有事」概念，已暗示將台海納入美日安全保障的範圍內，而在二〇〇四年底日本所公佈的「防衛計劃綱領」中，首

次將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列為充滿高度不確定因素的區域，指明對日本構成潛在威脅，在二〇〇五年二月，美、日外長與國防部長的「二加二」安全諮商會議中，華盛頓與東京更進一步宣佈台海安全為雙方所共同關切的利益，並將台灣海峽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

相對而言，北京對於日本未來的動向，所最不樂見的局面包括下列三種：(1) 日本突破道德禁忌與法律約束，擁有核子武器；(2) 東京選擇不再依賴華盛頓，或是美國勢力完全撤出遠東，導致日本成為無人能駕馭的脫韁野馬；(3) 美國將日本、南韓以及台灣納入其在東亞地區「隱性的反中聯盟」成員，其中的最後一項，為中國大陸所最不能容忍的發展。由此可見北京戰略思維上的兩難與美國的微妙角色，一方面，基於區域主導地位的爭奪，並避免成為被美、日所共同圍堵的目標，中國希望盡量削弱華盛頓在東亞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中國憂慮東京方面一旦失去美國的「保護管束」，將再度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屆時中國恐怕無法獨力壓制野心勃勃的武裝化日本。有鑒於此，如何巧妙介入，藉由平衡的美、中、日三角關係，維持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不僅是美國外交決策者所須面對的不變課題，更牽涉我方的戰略安全利益。

至於在中美關係的座標上，對台灣的影響更為重大，一九九三年柯林頓 (Bill Clinton) 總統上台後，在外交上奉行「交往與擴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的基本方針，在亞太政策方面是採取「深化同盟」與「全面交往」並重的策略，前者確認美、日安保同盟的重要性；後者則強調與北京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目的是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架構，誘導引此一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逐步接納西方的制度與價值觀，包括對於人權觀念的服膺、國際規範的遵循以及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奉行等，但反對者認為華府與北京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無異於與虎謀皮，因為中美關係與美日關係，正如同天秤的左右兩端，美國難以輕易取得平衡，換言之，不可能兩者兼顧而面面俱到，由於中美關係升溫的潛台辭，就是美日同盟地位下滑的警訊，因此對中強硬派嚴厲批判此政策，認為它損害美國於亞太地區的根本利益。

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繼任之初，不僅在國際事務上奉行單邊主義的美國優勢主導，更視中國政策為美國亞太政策下的一環，其

位階不應凌駕於美國亞太戰略的總體考量，因此一反民主黨人「以交往促成改變」與「和平演變」的浪漫期待，對北京的態度已明顯轉變，認為美國無必要為求顧全大局，而事事、委曲求全。至於在美中關係的定位上，則不再稱雙方為「建設性戰略夥伴」，而改以「戰略競爭者」

(strategic competitor) 的稱謂重新詮釋，直至中美軍機於二〇〇一年四月在海南島上空發生擦撞事件，小布希政府才將兩國關係的基調，調整為較不敏感的「建設性合作關係」(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九一一事件提供北京當局與華府改善關係的難得契機，雙方領導人均深切體認到，兩國在維持朝鮮半島局勢穩定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等議題方面，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美國東亞國務助卿佐立克(Robert Zollick)於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於「美中關係協會」的演講中，更以「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形容，重新定位美中關係。

儘管目前美國仍是鼓勵中國能於亞太區域，持續扮演建設性與穩定的正面角色，並冀望北京能夠選擇邁向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市場的道路，但無可諱言，美國仍視中國為未來挑戰其領導地位的最有可能候選者，在某種意義上，無論「中國和平崛起」(China's peaceful rise) 或「中國威脅」(China threat) 的論述與預測何者成真，而中國是否為不滿國際現狀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 的辯論，孰佔上風，無論何黨執政，華府仍將對北京保持警戒的戰略態勢。

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大陸的第四代領導人而言，儘管「和平崛起」、「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不搞擴張」與「永不稱霸」為其對外宣示的戰略主軸，但在北京的主觀認知方面，華府政壇、媒體與學術界中的新保守派在中國威脅論上的推波助瀾，對於美國的主流民意已產生深遠影響，那就是中國正靜悄悄的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新冷戰思惟下的頭號假想敵，加上棘手的台灣問題向來為美、中爭執的引信，一旦失控，極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最悲觀的看法是最終雙方難以避免兵戎相見，即使鄧小平所揭示的對美與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在於「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等方針，但北京並沒有把握在未來，能夠完全排除大國衝突的可能性。

對於保持對國際政治之敏感度方面，應重視後冷戰時期亞太情勢的重要變遷，兩岸關係的發展，無論是和是戰、是改變抑或持續，很難不受外部條件制約，或自絕於國際環境之外，例如北京新一代領導人對於和平發展、經濟發展與台灣問題等目標的輕重權衡、美國如何看待與定義崛起中的中國、美國中國政策的選擇是採取合作與圍堵互用、建設性交往還是以防範壓制為主軸、華府在全球反恐戰爭與北韓核議題方面與北京的利益均霑能否抵銷中國威脅論的力道、傳統的美日聯盟是能否持續，所有的面向不僅盤根錯節，更相互糾葛，均直接或間接影響我方的生存與安全，故政府重要對外決策的一舉一動，不應單就台灣內部的角度考量。